

ZHONGGUO JINXIANDAI WENHUA  
YU MAKESI ZHUYI ZHONGGUOHUA

# 中国近现代文化 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朱志敏 / 著



人民出版社

ZHONGGUO JINXIANDAI WENHUA  
YU MAKESI ZHUYI ZHONGGUOHUA

# 中国近现代文化 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朱志敏 /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吴广庆

封面设计:徐 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现代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朱志敏 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6.11

ISBN 978-7-01-016899-9

I. ①中… II. ①朱… III. ①文化发展-关系-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近现代 IV. ①K250.3②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3851 号

## 中国近现代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ZHONGGUO JINXIANDAI WENHUA YU MAKESI ZHUYI ZHONGGUOHUA

朱志敏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3.75

字数:340 千字

ISBN 978-7-01-016899-9 定价: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 目 录

<b>第一章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演变与选择马克思主义</b> .....	1
一、民初到五四知识分子政治心态的若干变化 .....	1
二、五四时期的平民主义思潮.....	10
三、五四运动前后 Democracy 译语的演变 .....	27
四、五四时代民主观念的特点.....	36
五、五四知识分子民主追求中的矛盾取向.....	60
六、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的理性缺欠 .....	81
七、自由主义与现代中国 .....	96
八、陈独秀、李大钊启蒙思想的特点 .....	100
九、高一涵论自觉心 .....	112
十、李大钊与胡适.....	122
十一、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	138
十二、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平民意识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 .....	147
<b>第二章 中国文化变迁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创新</b> .....	166
一、严复与中国文化现代化.....	166
二、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现代化 .....	177
三、研究中国共产党与文化关系的四个角度 .....	203
四、抗日战争时期的新文化建设 .....	208
五、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化现代化 .....	212
六、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化的进步 .....	220

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创新 .....	237
八、毛泽东与 20 世纪中国文化.....	244
九、百家争鸣的来龙去脉 .....	256
十、邓小平理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	266
<b>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学术发展与全球化背景下的 中国文化繁荣.....</b>	<b>279</b>
一、多学科研究与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279
二、经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299
三、现代口述史的产生及相关几个概念.....	311
四、口述史学能否引发史学革命 .....	324
五、口述史对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的三方面影响 .....	332
六、从社会史角度研究历史.....	340
七、后现代观念与历史研究.....	342
八、新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潮.....	349
九、从文化的古义论其当代的繁荣 .....	351
十、提高文化的质与量 .....	357
十一、日本的和谐文化 .....	359
十二、弘扬五四理性精神 建设文明社会.....	363
十三、文化与理性.....	368
<b>后 记.....</b>	<b>374</b>

# 第一章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 演变与选择马克思主义

## 一、民初到五四知识分子政治心态的若干变化<sup>①</sup>

从民国初年到五四前夕，中国政局经历了一个由统一到分裂的过程，知识分子亦经历了一个对民国政治充满希望到失望的过程。在这两个相关联的过程中，怀着对以往经历的反思，感受着来自国外的世界潮流，中国知识分子观察社会政治问题的着眼点，同民国前的戊戌、辛亥时代相比，发生了若干显著的变化。

### （一）从“救亡”到“建设”

中国进入近代以来，虽先有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的发生和一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但对知识分子产生最大震动的莫过于1894年的中日战争。以日本一个“弹丸”小国，竟使堂堂天朝积几十年力量建起的近代水师一败涂地。随之而来的《马关条约》和各国援例开始在中国掀起的大规模资本侵略，以及庚子八国联军入侵，使中国知识分子由来已久的危机意识陡然升到了最高点。从维新改良到排满革命，“救亡”始终是人们心中最关切的大事。翻开严复的《救亡决论》、康有为的上清帝书、梁启超的《变法通议》，以及其时革命者的宣言、主张，甚至一些保守派的言论，谁都会强烈感到当时人们慷慨激昂、发

---

<sup>①</sup> 本节内容曾发表于《中州学刊》1993年第2期。

愤救亡的悲壮神情。诚然，不同的阶级立场和不同的思想倾向，使他们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手段和选择了不同的目标。但有一点十分清楚，无论是保皇守旧、维新改良，还是反满革命，都和痛感中国即将覆亡的心态密切相关。民国成立，人们似乎得到了某种安慰，以为中国终于建起了可致富强的现代国家。此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帝国主义无暇东顾。在国内，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平心静气讨论如何建立理想的现代国家，“联治”还是统一？内阁制还是总统制？开明专制还是民主共和？这类在现实政治中不免带有民主和专制对立意味的概念，在多数知识分子那里，反映了对于国家体制问题的深入思考。然而，袁世凯的野心和强权意志把国家引上帝制复辟道路，从而使知识分子的政体争论变得毫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对整个辛亥革命及民国后的政治倒退的反思提上了日程。众所周知，陈独秀等从文化的层面寻找导致民国政治失败的原因，选择了启蒙的道路。启蒙，固然也是为了救国。但它所采取的形式和寻求的直接目标，毋宁是一种“建设”，一种文化的、心理的建设。孙中山从另一个角度明确表达了这个意思。他说，过去从事破坏太多，从事建设太少，这不能不是革命失败的一个原因。为此，他拟定了大部头的著作计划，坐下来从事“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的理论研究。尽管1915年发生了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事件，引起了1918年的学生“礼貌”请愿运动，但更多的知识分子当时注意的却是日本思想界掀起的“大正德谟克拉西”<sup>①</sup>思潮，后者竟成为五四时代中国民主思想发展的动力之一。<sup>②</sup>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是作为侵略一方的德国失败。巴黎和会前夕，威尔逊鼓吹“民族自决”。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分享殊荣，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民族危亡的气氛。五四运动发生

---

① 是指1912—1926（亦有说1905—1925）年日本“大正”时期出现的民主思潮及民主改革运动。

② 其时，中日之间文化交流已十分密切，北京大学法科教授陈启修写道：“中国政论界及学界近时万事皆受日本之影响”。参见《庶民主义之研究》，《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

前后，爱国救亡的呼声重新响起。但我们也应看到，此时人们更多的是对巴黎和会列强不履行“公理”诺言，反迫使中国接受屈辱不满；对于作为战胜国还要丢失领土不满；对于袁世凯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不满；对软弱政府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不满。人们“反帝”的目标多半只针对日本。这和甲午、庚子之后那种“亡国灭种”在即的情形不完全相同。因此，当时出版的许多期刊，诸如《新教育》《新生活》《新社会》《新中国》《建设》《曙光》《少年中国》等名目，都在呼吁新时代到来，都是在从事新国家、新政治、新社会、新文化的思想、理论建设。人们此时关心的重点与其说是如何“救亡”，不如说是如何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如何争得在世界各民族中的平等地位，如何赶上，以至于超过西方国家。

## （二）从“竞争进化”到“互助进化”

“进化”的观点，自严复译《天演论》以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接受的、观察历史和社会现象的基本工具。与“救亡”的心态相联系，强调在动物和人类的进化中“竞争”起决定性作用的“竞争进化”论成为戊戌、辛亥时代思想的重要内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出自严译《天演论》的语言，几乎成为其时知识分子和革命者人人乐道的警句。而1907年由无政府主义者开始介绍的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似乎没有引起多少人注意。《互助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认为，在动物和人类的进化中，“互助”起决定性作用，故也被称作“互助进化”论。与“竞争进化”论相比，二者在承认“进化”上是一致的，对推动“进化”的原因的分析则不同。民国成立之初，“竞争进化”论的影响仍很大，因之“军国民主义”盛行。“所谓军国民者，就是以国民而兼为军人，有尚武之精神，而有国家之思想者。”<sup>①</sup>与此相应，民初的教育思潮中，“军国民教育”亦颇受推崇。担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就把“军国民教育”列为民国教育“五种

<sup>①</sup> 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20页。



主义”之首。<sup>①</sup>蔡元培本人并非“尚武”崇力，他对重道德伦理的传统文化和重实利、讲自由的西方近代文明都有较深的认识，并且有着将二者融为一体的愿望。<sup>②</sup>因此，上述做法无疑是其时社会思潮和知识分子普遍心理倾向的反映。1917年，蔡元培从国外归就北京大学校长不久，即在几次讲演中提到“互助论”。<sup>③</sup>陈独秀、李大钊等此时则有“互助之自觉”和“协力之文明”的说法。<sup>④</sup>与此同时，无政府主义者开始在国内出版《自由录》《劳动》等刊物，宣传“平民革命”和“互助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军国主义的失败和“协约”国家的胜利给中国知识分子树起“互助论”战胜“强权论”而成为世界新潮流的观念。<sup>⑤</sup>此后，李石曾、区声白相继翻译《互助论》，<sup>⑥</sup>蔡元培、高一涵、周建人等先后介绍“互助论”。<sup>⑦</sup>“互助论”不胫而走，很快成为知识分子的口头禅。而“军国主义”和“军国民教育”思想则渐为人们所抛弃。<sup>⑧</sup>

### （三）从注重“政治”到着眼“社会”

戊戌时代的维新志士想依靠光绪皇帝进行改革。康有为多次上书和光绪的变法诏书都包含有不少涉及社会改革的内容。这可大体上视为

- 
- ① 参见《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幕词》，《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见《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63、130页。
- ② 参见《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幕词》，《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见《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63、130页。
- ③ 参见《蔡元培致〈新青年〉记者函》，《新青年》第3卷第1号。
- ④ 参见陈独秀：《答I·T·M》，李大钊：《青年与老人》，见《新青年》第3卷第2号。
- ⑤ 参见《黑暗与光明的消长》，见《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6页。
- ⑥ 李石曾的译文见《东方杂志》，1919年；区声白的译文见《民风》，1919年5月。
- ⑦ 参见蔡元培：《欧战与哲学》，《新青年》第5卷第5号；周建人：《生存竞争与互助》，《新青年》第8卷第2号；高一涵：《“互助论”的大意》，《新中国》第1卷第5号，1919年9月15日。
- ⑧ 其时，批驳“军国民教育”主张的文章很多，参见幻龙：《新教育谈》，《教育杂志》第11卷第6号，1919年6月；姜琦：《何谓新教育》，《新教育》第1卷第4号，1919年5月。

从政治入手改革社会的路径。“政变”的发生使变法归于失败，但“新政”的实行，却似乎又给改良派以希望。这样，辛亥革命前的一段时间里，有影响的舆论是围绕实行革命、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政治，还是继续改良实行君主立宪政治展开的。辛亥革命后，人们一度注意的亦只是国家和政府体制的建立等问题。这些情况表明，此时人们关注的重点是“政治”。如前所述，袁世凯的专制行为使知识分子的讨论、建议徒具空文，而一些官僚、政客以“政治”谋取私利的争持对抗更使知识分子产生普遍的厌恶“政治”心理。1915年1月，梁启超写下这样的话：“问者曰：吾子不云乎，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已一空而无复余。夫我国民前此固共信国之可救也，奔走谋救之者，亦既有年，仁人志士既竭心力继之以血者，且不知几何姓矣。而结果竟若此，自今以往，即共持吾子所谓明了坚强之自觉心者，而报国亦有何道？应之曰：不然，我国民前此之失望，政治上之失望也，政治不过国民事业之一部分，谓政治一时失望，而国民遂无复他种事业，此大惑也。且政治者，社会之产物也，社会凡百现象皆凝滞腐败，而独欲求政治之充实而有光辉，此又大惑也……吾以为中国今日膏肓之疾，乃在举全国聪明才智之士悉辘集于政治之一途……故社会事业一方面虚无人焉……呜呼，我国民乎，当知吾侪所栖托之社会，孕乎其间者不知几许大事业，横乎其前者不知几许大希望，及中国一息未亡之顷，其容我回旋之地不知凡几，吾侪但毋偷毋倦，毋躁毋鹜，随处皆可以安身立命，而国家以利赖之。”<sup>①</sup>这里说出了知识分子对民国从希望转为失望的心态；说出了“政治”以“社会”为基础的道理；说出了从事社会事业，对于知识分子施展救国抱负的意义，为对“政治”失望的知识分子指出了投身“社会”的道路。由于这些说法表达了其时知识分子的心理，因此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人纷纷转向关注社会教育、实业、文化问题。到1917年年初，“社会、社会”之语已成为“最时髦之口头禅”<sup>②</sup>。从某种意义上看，

①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03—704页。

② 陶履恭：《社会》，《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1日。

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即与这一心态转变相关。

此外，还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促进了“社会”一词的流行和知识分子由重“政治”转为重“社会”的思想变化。一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非政治”宣传。众所周知，无政府主义是以铲除一切政府，实现“无强权”“无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为宗旨。尽管在人们看来，消灭政府本身未免太异想天开，但它对少数人依政治权势压迫人民的揭露，对强权的藐视和抨击却对厌恶政治与不满军阀官僚统治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人产生影响。二是有关“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观念的流行。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有“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之说，但许多人，包括孙中山本人在内，都认为辛亥革命只是一场没有成功的政治革命。由此引起了对单单进行政治革命可以救国的可靠性的怀疑。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加深了人们对这两个观念的理解。李大钊所做的两种革命具有不同时代性意义的解释，表达了部分知识分子的看法，并逐渐为更多人接受。人们感到，“政治革命”只能带来政治的改造；民主政治的建立在各国，包括在美、英、法这样的发达国家也还没有实现完全的平等；只有“社会革命”才能改造整个社会。三是人们理解中“民主”概念的变化。五四以前知识分子中多数人理解的“民主”只是政治意义的，即“国家组织之一种”<sup>①</sup>。五四时代则出现了“工业民主”“社会民主”，以至于“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文学的”等名目的“德谟克拉西”。在人们想来，既然民主本身都带有了“社会”的含义，单纯的政治改革更不足道，“社会改造”因之成为响亮的口号。其时“劳动问题”“女子问题”“生计问题”“婚姻问题”“家族问题”……诸如此类“社会问题”的提出并引起普遍兴趣，即与关注“社会”的心态相关。应当指出，一切社会问题或多或少都与政治相联系。在当时的中国，“政治本位”的封建文化传统还相当浓厚，军阀、官僚、政客与外国势力相勾结，把持政权，压制民主，政治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无法解决。因此，五四运动以后，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又

<sup>①</sup> 谭鸣谦：《“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5月。

重新关注起政治问题。

#### （四）从注重中上层社会转为重视下层平民

戊戌时代的知识分子以皇权作为改造社会的主动动力，辛亥时代的革命派所依靠的是少数革命党人、华侨商人、进步军人、会党势力等，下层平民较少成为被关注的目标。这种情况与上面所说关注政治的心态是一致的。随着人们对“政治”的失望和对“社会”的关心，亦随着人们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总结反思，知识分子的目光逐渐转向下层平民。<sup>①</sup> 陈独秀认识到，人民群众不觉悟是政治改造不成功的根本原因，提出了改造国民性，建立“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以代替“伟人大老”的“贤人政治”，以“国民运动”代替“党派运动”的主张。尽管他所说的“国民”含义并不明确，他最初所寄望的只是“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但他从“国民”与“民国”的关系看问题，并将提倡“国民政治”同批驳“贤人政治”联系起来，其态度与观点已和戊戌、辛亥时期的改良派、革命派有所不同。<sup>②</sup> 李大钊从“民彝”与政治的关系着眼，虽然仍以代议政治为良好政治形式，但他强调“国法与民彝间之联络愈易疏通”，政治应充分“信其民彝，彰其民彝”，也就是说，要使民众由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愿望、要求、意志及其衡量是非标准与能力作为政治的基础和国家法律、政策的出发点，这样就把平民百姓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凸现了出来。<sup>③</sup> 孙中山认为，民国政治建设的失败在于“民权未张”，民国未“筑地盘于人民之身上”，由此提出了“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谓民国也”；“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此谓四大民权也”。这一对“民国”“民权”概念相区

① 参见壮游：《国民新灵魂》，见张树、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574页。

② 参见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一九一六年》《敬告青年》等文。

③ 有关“民彝”的解释，参见朱成甲：《李大钊早期思想和近代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朱志敏：《李大钊的民彝政治观》，《江淮论坛》1989年第6期。

别的认识<sup>①</sup>，应该说，正表达了他对人民与“民国”之间关系理解的深化。此外，前面提到的无政府主义者“平民革命”的宣传<sup>②</sup>和此期开始逐渐流行国内的“泛劳动主义”“劳工神圣”“工读”等观念，都促使着人们把目光投向下层人民。而在这方面起到最有力作用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无论赞成者、反对者、怀疑者，都不能不承认，那是一场下层人民为求“面包”的革命，其结果建立了“劳农政权”。它为革命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点，使他们认识到人民群众不仅作为社会主体，而且作为社会革命力量的重要性；另一些知识分子则由此认识到深受压迫的下层人民一旦“揭竿而起”所具有的巨大“破坏”力量；当然也还有不少人出于对下层人民生活困苦的同情和从思想上意识到劳动的崇高和劳动人民的可敬。总之，许多知识分子对下层人民产生了关注的热情。有提倡“平民文学”“平民教育”“平民经济”者；有筹设平民学校、平民银行、平民工厂、平民图书馆者；有以“平民”为名，或以“发表平民自由意见”为己任的期刊报纸<sup>③</sup>；还有宣传“自下而上”改造，实行平民革命运动者……“平民”成为社会上的时髦名词。五四时代“平民”一词的广泛流行适与戊戌、辛亥时期“国民”一词的广泛流行相映照，鲜明地反映出知识分子心态的转变状况。大体说来，戊戌、辛亥时期的“国民”概念是指有觉悟、有能力的“公民”。邹容写道：“国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之公权，有自由之幸福，无论所执何业，而皆得为完全无缺之人。”<sup>④</sup>梁启超写道：“群族而居，自成风俗者，谓之部民，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sup>⑤</sup>另有

① 参见孙中山：《在沪举办茶话会上的演说》，见《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25—331页。

② 参见声白：《平民革命》，《自由录》第2集，1918年5月。

③ 参见《新人》第1卷第3号《新人社消息》，见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18页。

④ 《革命军》，见张树、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671页。

⑤ 《新民说·论国家思想》，见《饮冰室文集》卷五，（台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页。

一篇文章作了个形象说明：“于亿兆京垓仆缘大地之黔首，独取其秀而灵者，宠之曰国民。”<sup>①</sup>显然，所谓“完全无缺”“能自布政治”的“秀而灵者”，不是指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五四时代的“平民”多半是指非贵族、官僚、军阀、资本家，甚或非“知识阶级”的下层民众。受益的文章认为，平民应该包括：“（一）无资本之贩卖商；（二）劳银微薄之劳动者；（三）小规模商店之学徒或店伙；（四）学有小技艺求售于道路者；（五）无能力之老年者；（六）无能力之未成年者；（七）无职业之中年男女；（八）仆役或其他各项”，而“官吏大商，以及知识阶级中人等……一般心理假设之定义，皆不在（平民范围）内”。<sup>②</sup>王光祈指“一般平民”为“劳农两界”。<sup>③</sup>李璜认为，中国的“平民里头自然是农民占大多数”<sup>④</sup>。沈泽民写道：所有号称“平民”什么、“平和”什么的，都是“平民”其名而“贫民”其实<sup>⑤</sup>……以上所引资料足可证明“国民”“平民”概念的区别，从而说明二者转换反映了知识分子心态的变化。须指出，这两个概念对不同的人，含义不一定完全一样，且在戊戌、辛亥时代也有“平民”一词的出现，在五四时代亦有“国民”一词流行。我们这里仅是就大体的观察指出其倾向性的变化。

以上分四个方面概述了从民初到五四知识分子政治心态的变化。不难看出，这几方面的变化虽然不是同时发生，它们之间却有着内在的联系：在前一时代，强烈的“救亡”心理，不能不强调“竞争”意识，不能不抓住政治变革这一被认为是致弱也能致强的枢机；而改良、革命在当时的情况下，又只能靠少数人或上层人来进行。对于多数民众来说，灌输“国民”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亦是“合群”救亡的需要。在后一时代，相对的“建设”心理与“社会”的视野、“互助”的观念易引

① 蛤笑：《论地方自治之亟》，见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9页。

② 《平民教育与平民生活》，《新中国》第2卷第6号，1920年6月15日。

③ 《“少年中国”之创造》，《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1919年8月15日。

④ 《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1期，1919年3月1日。

⑤ 《这不是慈善事业呢！》，《妇女声》第6期，1922年3月5日。

起共鸣，而“社会”的“建设”目标和“互助”的意识又与“平民”的生活改善关联。当然，这一系列相关性心态的转变不是知识分子本身意识随意发展、变化的结果，而是对以往经历的反思和对社会现实的观察，以及对不断发展着的世界局势的分析、对世界潮流的认同各方面意识互相影响的结果。因此，它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社会的产物。

## 二、五四时期的平民主义思潮<sup>①</sup>

从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角度观察，五四时期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多种外来思想涌入，引起国内思想的大变动与大发展。平民主义思潮就是近代民主思想在这一时期变化、发展的结果。“平民主义”一词是英文 Democracy 的翻译语，五四时期人们一度采用这一词汇代替以往的“民主主义”“民主政治”等译语，自有其认识上的理由。如果我们从社会思潮，即从同一历史时期社会上某种带有一致倾向的认识着眼考察时人的这一认识理由，就会发现，“平民主义”的含义的确不同于五四以前人们理解的“民主主义”，从而也就不同于今人通常解释的——“资产阶级”的或“旧”的——民主主义。它表达了当时人们对德谟克拉西的新理解，是一种新的民主主义。本节试图就这一思潮的起因、内容、特征及其意义作一初步探讨。

### （一）

平民主义思潮的引发契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战胜的结局。在当时，大多数中国人还不能从资本帝国主义自身发展的规律分析战争的起因与性质，许多人把大战看成是人道主义与霸权主义的战争，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战争。对于十月革命，一些目光敏锐的知识分子和进

---

<sup>①</sup> 本节内容曾发表于《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原题为《论五四时期的平民主义思潮》。

步青年已经意识到：这是 20 世纪的新曙光，是不同于 18 世纪法国政治大革命的、20 世纪的社会大革命。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先进分子，也还来不及分辨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究竟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他们认为：俄德等国的革命也是世界民主潮流的表现，只不过是不同于 18 世纪法国革命时政治的民主主义，而是 20 世纪社会的民主主义罢了。这样，无论是对欧美民主政治制度抱有好感的人，还是倾向于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人，都对战后民主潮流即将普及世界深信不疑。蔡元培预言：战后“光明的”平民主义必将发展<sup>①</sup>；李大钊认为：战后的时代就是德谟克拉西的时代<sup>②</sup>；傅斯年指出：“这德谟克拉西一个主义正在那里摇天撼地，一泻千里”，它“是光明的代表，是我们未来一切的希望和幸福所托命”<sup>③</sup>；陈启修写道：“人文进化，世风丕变……德谟克拉西遂为一世之标语”<sup>④</sup>。这种对战后世界潮流大体一致的看法，形成了平民主义思潮赖以产生的社会思想基础。

平民主义思潮发生在 1919 年年初，有两个明显迹象：其一，五四期间著名期刊《新潮》《国民》《北京大学月刊》都创刊于 1919 年 1 月 1 日，《每周评论》则创刊于一星期前。在这些刊物的最初几期就都出现了鼓吹德谟克拉西的文字。自这时起至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上陆续出现的数百种新思潮刊物，和原有的一些报刊，大都把宣传德谟克拉西作为一项主要内容。<sup>⑤</sup>其声势之浩大，与 1919 年以前只有《新青年》等少数刊物宣传民主（在五卷五号以前的《新青年》杂志上也很少见到“德

---

① 参见《黑暗与光明的消长》，《蔡元培全集》第 3 卷，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217 页。

② 参见《劳动教育问题》，见《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632 页。

③ 《去兵》，《新潮》第 1 卷第 1 号。

④ 《庶民主义之研究》，《北京大学月刊》第 1 卷第 1 号。

⑤ 1920 年年初出版的《新社会》第 7 号，有郑振铎写的《一九一九年中国出版界》一文，其中写道：“就十一月一个月里而论，我所知道的，已有二十多种月刊、旬刊、周刊出现了。他们的论调虽不能一致，却总有一个定向，就是向着平民主义”；1920 年 9 月出版的《新青年》8 卷 1 号一篇通信也写道：“现在北京、上海及各处地方出版的新杂志很多……大抵都含有德谟克拉西的意味”。



德莫克拉西”字样)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这里似乎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陈独秀在1915年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时就揭出的“人权”一词,直到1919年1月15日才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作出与“德莫克拉西”相应的“注释”;其二,前期《新青年》宣传人权的用意,很大程度在于运用它攻击、批判传统的封建文化,以启发青年和民众觉悟。而1919年1月《北京大学月刊》创刊号发表的《庶民主义之研究》则掀开了研究德莫克拉西内容的第一章。从某种意义上说,1919年开始,人们在宣传德莫克拉西的过程中,带有了从研究入手,重新认识其思想内容,为建立理想的德莫克拉西社会而描绘蓝图的成分。正是在这样的研究中,人们赋予了德莫克拉西许多新的含义,从而形成了与“欧美思想界之所谓德莫克拉西”不同的、“中国学术界里自有他们特别的解释”的德莫克拉西<sup>①</sup>。对这种新的德莫克拉西,李大钊有过精彩的说明:现代的德莫克拉西“普被人类生活的各方面,自政治、社会、产业、教育、文学、美术,乃至风俗、服饰等,没有不著他的颜色的”<sup>②</sup>;它“是一种气质,是一种精神的风习,是一种生活的大观;不只是一个具体的政治制度,实在是一个抽象的人生哲学;不仅是一个纯粹的理解的产物,实在是濡染了很深的感情、冲动、欲求的光泽”<sup>③</sup>。李大钊本人曾先后采用“平权主义”<sup>④</sup>“现代民主主义”“德莫克拉西”音译及“平民主义”来表达这种新的德莫克拉西概念。他解释说,如果译作“民主主义”,“则嫌他政治的意味过重,所能表示的范围倒把本来的内容弄狭了”,“为了便于通俗了解起见,译为:‘平民主义’”<sup>⑤</sup>。李大钊的解释,以及他的翻译

---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卷)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25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9页。

③ 《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9页。

④ 《Pan……ism之失败与Democracy之胜利》,见《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91页。该文发表于1918年7月,表明李大钊此时对德莫克拉西的认识已开始变化。因在同一时期这类材料不多见,将其作为社会思潮的开端似不如作为它的先声更合适。

⑤ 《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80、590页。